



敦煌莫高窟。资料图片



游客在甘肃敦煌印局参观。新华/传真

# 将流散的敦煌丝绸“采”回家

2025年年底,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重量级著作的发布——《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与《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以下简称《大系》)。

这两部著作,代表着中国丝绸研究的两座里程碑:《全集》为一场历时18年的跨国合作精彩收尾,第一次把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在纸上“拼”完整了;《大系》则开启一个更庞大的计划,用10年时间,出版100卷,把全球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家底”摸清楚。而这一天,距离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了120多年。

这,不只是新书发布,更是一场关于国家记忆的追寻。那些流落海外、脆弱易损的绫罗绸缎,经过中国学者团队近20年的奔走,终于从世界各地的库房里被一件件找出来、拍下来、修复好,在学术意义上“回家”了。

## 补上“缺失的拼图”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点: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而作为丝绸之路最鲜活物证的丝绸,却几乎被学术界遗忘,成了一大研究空白。

“敦煌壁画、文献、丝绸,这三者其实是鼎足而立的。”在北京大学教授靳新江看来,这种学术上的失衡是一种遗憾。以往,学者要么埋头文书,要么专攻壁画,唯独藏经洞出来的绢画和丝织品,因为实物太少,一直被冷落。

这种忽视的背后,是一段文物流散的痛史。1900年藏经洞开启后,一些国外考察队携走了数以千计的丝织品,它们大多入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海外机构。国内仅旅顺博物馆与敦煌研究院有部分收藏,精华大多流散。

但这块“拼图”不可或缺。在靳新江的解读中,丝绸不仅是实物遗存,更是连接壁画与文献的关键桥梁。壁画暴露于外,色彩千年变迁,而绢画深藏洞窟或库房,颜色仍保持鲜亮,可借此推想唐代壁画的原始风貌。此外,丝绸上记录的供养人信息能与文书对应,工匠的创作、生活场景在文字与图像间彼此印证。唯有将三者结合,敦煌学的脉络才完整。

为填补这块空白,自2006年起,浙江大学教授赵丰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大学及海外十余家机构组成国际团队,开启了漫长的“寻丝之旅”。

这不简单的拍照存档,而是一场精细协作的学术攻坚。华东大学服装与设计系史论部主任王乐、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和徐铮等核心成员,多次深入海外库房——在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了约250件纺织品和400件残片;在法国巴黎,他们与博物馆合作,邀请专业修复师对丝绸进行保护处理,并两度赴法完成资料记录;在俄罗斯、日本以及我国旅顺、敦煌,类似的沟通、记录与研究反复推进,步履不停。

历经18年耕耘,随着6卷本《全集》的出版,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首次在学术意义上实现了“团圆”。这不仅填补了敦煌学的一块关键空白,更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跑”开始走向“领跑”。

## 为2000余件珍品做“CT”

如果说《全集》是深度聚焦于敦煌一域,那么《大系》便是一张面向全球的学术巨网。

这项工程更为浩大——计划用10年时间,调查全球80多家博物馆,整理出100卷图录。此次发布的第一辑共12卷,仅是一个开

端,却已收录来自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2000余件丝绸珍品,年代从战国贯穿至近代,规模与分量令人瞩目。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力气做这件事?因为中国古代丝绸研究,正站在一个从“经验鉴赏”迈向“科学分析”的转折点上。

“丝绸太脆弱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说,不同于青铜器的结实,流传下来的丝绸,要么珍贵得像碧玉一样,难得一见;要么就是残片碎絮,一碰就碎。很多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丝绸,入馆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有的挤在狭小的抽屉里,有的甚至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如果不进行系统整理,这些文物可能长期“沉睡”库房,直至湮灭。

研究方法也得更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坦言,以前看卷轴画,博物馆光线暗,肉眼根本看不清绢本是哪个朝代的、怎么织的。“断代常依赖风格分析,容易见仁见智。”他认为,现在的研究很需要“硬证据”。

翻开《大系》,这种“硬指标”清晰呈现。每件文物不仅有艺术全貌,更配有显微镜下的高清图像与专业的织造结构示意图。平纹、斜纹、经锦、纬锦……通过严谨的技术分析,文物断代有了更科学的依据。这种“技术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在重塑学界对中国工艺美术的认知。

“我们常提四大发明,但在工艺美术史上,丝绸与瓷器同样是重大创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表示,瓷器研究已成体系,海内外名品世人皆知;而丝绸研究却因实物脆弱、资料分散,始终滞后。《大系》全面收录海内外藏品的做法,为研究奠定了极其充实的资料基础。



(唐)黄地团花纹锦。资料图片

## 看得见的“乡愁”

北京大学教授董强是杭州人,对丝绸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曾随团参观法国吉美博物馆,当馆长戴着白手套,与修复师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耗费一年多才修复完成的敦煌绢画时,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为之震撼。

“敦煌文物,是系在中国人心里头的一个结。”董强坦言,面对那些流失海外的文明遗珍,中国学者心中总会泛起一种复杂的情感,驱动着一代代学人致力于让文化遗产“回家”。

“《大系》一旦出版,这些文物的数字信息与研究成果就回到了中国。”项目团队成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特聘研究员王丹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物回归。

曾经,中国学者研究敦煌丝绸,必须远赴重洋,申请调阅,甚至要依赖外文报告。董强曾在三峡博物馆见过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文凭,那是颁发给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纺织学位证书——当年学织技术,竟要去法国。

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学术团队将散落全球的丝绸资料汇集、整理,并以中文编目,以中国的学术框架进行界定、分类与研究。“这使得丝绸研究的知识主体性

真正回归中国。”董强预见,未来国际学者欲深入研究丝绸,或许首先要查阅这套由中国编纂的权威著作。

这种回归,也在悄然重塑学术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杭春晓提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山东临淄一座古墓曾出土一对绘有图案的贝壳,考古队起初未予重视,将其搁置库房。直到后来发现美国博物馆藏有类似文物,才意识到其独特价值。

“这就是学科视野的局限。”杭春晓说,许多文物在单一领域内可能不起眼,但将全球丝绸材料汇聚一处时,材料的“密度”就改变了,原本孤立的碎片便产生了关联。这片残骸上的纹样,或许能解释壁画中人物的服饰;那件袍服的织法,也许可印证史书中的某段记载。

## 为了“一百卷”的承诺

这项“寻丝”工程的规模确实浩大,就算在国内也不容易。故宫博物院官延历史部主任严勇直言:“很多博物馆根本没有现成的合格照片。”以故宫为例,其收藏的18万件织绣文物虽居世界之冠,但现有影像资料无法满足出版要求,必须协调库房、安保、摄影、修复等多部门,重新进行专业拍摄。

在海外,困难更多。每件文物都得协调拍照,每张图片都必须达到出版精度,每条说明都得仔细考证。还有语言障碍、制度差异、复杂的版权条款,都是横亘在前的问题。有些博物馆积极配合,有些则需要漫长的沟通与等待。为此,团队成员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库房、实验室与会议室之间。

《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刘曙光见过赵丰“拼命”的样子。2024年4月,赵丰为了争取收藏家普利兹克的资料专门飞到美国芝加哥。刘曙光见到他时,他腿脚已经不太利索,等电梯时甚至站不住,干脆坐到地上,笑着说“藏了脚”。后来回国一查,根本不是普通的扭伤,是骨折。刘曙光感慨:“忍着疼这么跑来跑去,不光是因为责任,更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个宏愿——把中国丝绸艺术的全球知识体系建起来。”

如今,《大系》第一辑12卷已静静置于学者们的案头。这12册厚重图录,只是一个宏伟蓝图的开篇。按照规划,《大系》中国内外藏品约占一半。未来多年,赵丰和团队还得继续跑,去更远的地方,敲开更多博物馆的门。

前路依然漫漫。但学者们翻着还带着墨香的新书,心里是有盼头的。一如织工面对万千经纬,中国学界正以同样的耐心与执着,将一段断裂的丝绸历史,重新织合成卷。

李苑

# 我国最早 前所未见 清华简里藏着一部马类“小百科”

清华简最新成果日前发布,内容与“马”有关。此次披露的马政文献均前所未见,对研究先秦科技史与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亮相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包含《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5篇竹书,是我国关于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领域最早的文献。

《胥马》类似伯乐“教科书”。40支简聚焦相马之术,详细描述了12类马匹的形貌特征,阐明鉴别标准,对研究古代相马术、畜牧史及动物考古等具有重要价值。

《驯马》是驯马师的培训手册,记录了训练与饲养马的方法,强调科学养马。比如,简文记载了每次驯马往返十里,安排步、跑、驰、奔、骋等不同训练内容。每个往返结束后,按照训练强度确定饲料和饮水量。

《驭术》《驭马之道》分别收录了38支简和12支简。前者全面介绍如何根据马的肢体动作驾驭马匹,填补了中国古代驭马技文献的空白;后者主张

“徐图缓进、恩威并施”。

《凡马之疾》共24支简,其中第13支缺失,实存23支,系统记录了马匹各类疾病及其症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专门论述疗马的文献,对中国古代兽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总数近2500枚,是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师生团队以每年一辑的速度公布整理报告,并开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和英译系列丛书编纂,促进海内外传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第二辑5至8卷同步亮相。该系列计划出版18卷,收录已整理公布的全部清华简,根据最新研究进展对释文进行全面校订和注释,并将艰涩难懂的战国竹书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也发布了第7卷。

何蕊

# 《永乐大典》存卷八成已影印出版

近日,《永乐大典》研究中心工作会议举办。会上宣布,国家图书馆持续推进《永乐大典》存卷仿真影印项目,截至目前已累计出版20种357册,约占已知总量的81%,尚未出版的已不足百册。

国图仿真影印版《永乐大典》在版式、用料、装帧等方面全仿明嘉靖副本,最大限度再现《永乐大典》的版式之美、书写之秀和插图之工。同时,完整保存数百年沧桑巨变在原书上留下的相关信息,如铃印、递藏信息、修复痕迹等。

在影印出版的图书中,5册10卷为首次出版,包括辑熙堂藏卷2268至2269、卷7391至7392,国图馆藏《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等,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当日,《清抄本(永乐大典)》新书亮相。该书收录清抄本18册21卷,包括玄字韵16册18卷及广字韵2册3卷,内容涵盖《太玄经》《广州府志》等重要文献。其中所引《南海志》《图经志》等诸多文献或已散佚或仅存残帙,弥足珍贵。

据介绍,国图现藏《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的一半以上,是《永乐大典》的最大藏家。2021年,该馆成立《永乐大典》研究中心。自启动《永乐大典》存卷仿真影印项目以来,该馆已系统整合流散于全球30多家公私收藏机构的残卷,通过高精度影印技术实现文献的“再生性保护”,并逐步构建起一套收录全面、还原度高的权威版本体系。

路艳霞

# 书店记事



内山书店内景。

# 内山书店的幽默感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鲁迅先生去过约500次内山书店,我去过3次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去的是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我去的是2021年至2023年在天津的内山书店。我深知在这跨时空的同名却不同址的书店里,是遇不见鲁迅先生的,但因为他的缘故,每次进内山书店,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情绪也证实,“复活”内山书店,是多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距离北京不过半小时高铁路程的天津,对我来说并非“无穷的远方”,而是抬脚就可以到的“近处”,这些年因为喜欢天津的生活节奏与文化氛围,常把这座城市当作周末的目的,去的地方次数多了,对于天津的五大道、小白楼、天津之眼摩天轮、意大利风情街等已经很熟悉,但三次去不同的内山书店分店,却颠覆了这一熟悉感——三家分店在给我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带来迷惑感,内山书店的存在,给天津这座城市增添了层次与神秘。

按照通常逻辑与现实可能性,内山书店即便“复活”,首选之地也应是上海,最好是在四川北路2050号旧址原地重建,但现在的这个地址,已经是一家银行门面,仅挂了一块“内山书店旧址”的金属牌。内山书店能够在天津落地,得益于一位名叫赵奇的天津人,他曾在电视台工作,曾赴日本采访内山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的后人,由此建立了联系,在征得内山完造后人的支持下,

内山书店得以在天津落地,这件带有传奇色彩的事,也成为2021年书店业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

一家书店老板的性格就是书店的性格,几次接触内山书店的人,觉得他们无论是天津本地人,还是北京过去的人,都带有“眼儿”的气质,无论是现场见面还是朋友圈交流,都带有“语不惊人不要休”的喜悦……我曾幻想,鲁迅先生要是穿越而来,在书店里流连忘返,遇到书店里的店员,没准也会被逗得莞尔。真实的大先生,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般严肃,夏衍曾说他“幽默得要命”,陈丹青评价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可惜的是,鲁迅虽数次路过天津,但真正停留天津只有一次,时间是1912年6月10日至12日,任务是考察新剧,虽然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这位绍兴人在天津度过的三天两夜,也当然是愉快的吧。

天津人开的内山书店,时常把新书发布或签售搞得像脱口秀现场,但在做书店方面,确实也有令人钦佩的认真与仔细,内山书店的三家分店,统一风格的同时也有差异化服务,无一例外都在细节上考虑得十分周到,这说明幽默的天津人开玩笑开玩笑,做起事业来依然无比投入。

2025年,内山书店把分店开到了深圳,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虽暂未拜访过,但由此也让我觉得,早晚有一天,内山书店会开到上海去。